

新世纪以来我国国防经济的热点问题

——访国防经济学家、原军事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庆林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朱庆林教授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著名专家,曾任原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国防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与朱庆林教授相识于1988年,是在国防大学召开的第二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军事经济研讨会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那时,他4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学术黄金期,当时已经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取得不俗的学术成果。此次到武汉访问朱庆林教授,不想却是30年后。当然,我访问的主题还是国防经济问题,毕竟已经在此领域辛勤耕耘30多年,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动员方面,著述丰硕,成绩斐然,为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建设贡献了许多理论智慧。

朱庆林教授在简要回顾了我国国防经济研究的历史后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创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其特征表现在,第一,全面性。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创新热潮,涉及面较广。从基本范畴到基本规律;从规模调整到功能矫正;从总体模式设计到政策措施选择;从资源配置效率到制度创新成本;从运作方式变更到管理体制变革等等,都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第二,本土性。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中国实际出发,创新国防经济理论势在必行。从理论创新成果看,大多数集中在剖析、回答中国国防经济的热点问题,是反映中国国情的国

防经济理论成果。这是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是实现国防经济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标志。第三,阶段性。从总体上看,对新时期国防经济的认识仍处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转化之中,这一认识过程尚未完结。伴随着和平崛起进程,中国国防经济建设处于迅速调整和发展之中,与此相适应,人们的认识也应向前发展。

关于新世纪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发展新的热点问题。朱庆林教授认为,新世纪最初20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在历史性地创造“全面和谐与合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同时,中国的发展处在地缘战略包围中,中国只有具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才能实现和平崛起。此外,新军事变革正在深入发展,信息化将全方位地推进军队建设乃至整个国防建设持续发展。中国国防经济建设面临的战略环境、战略任务、战略重点等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判断和把握这一变化和趋势,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选择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的基础。

党的十七大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我们党着眼于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政府和军队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军民融合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四川绵阳国家科技城、中关村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示范基地、陕西省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基地、军队药品社会化储备等一大批军民融合先进典型涌现出来。但是应清醒地看到,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军民融合这一进程尚发展

的空间。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会议上指出,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这些都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提出的新构想和新要求。

关于军民融合实践与理论。朱庆林教授说,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不断掀起军民融合的研究热潮,人大财经委组织专家开展专题研究,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军事科学院联合主办军民融合论坛,把研究推向高潮;军事科学院成立了军民融合研究中心,建立了军民融合理论研究的学术性组织。围绕理解和贯彻军民融合战略思想,广大专家学者开展了热烈讨论,推出了一大批著作和研究报告。这些成果是我国军民融合理论研究的初步结晶,也是军民融合实践的经验总结。但是我们应当清醒看到,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需要我们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开展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关于国民经济动员问题。朱庆林教授观点鲜明地提出要推动国民经济动员常态化建设,就是政府运用行政资源和市场手段,对国民经济动员资源、动员机构职能和动员方式等进行一系列调整的过程。其内容包括:一是积蓄动员潜力;二是建设、调整和保存动员能力;三是调整动员机构和职能;四是调整动员活动方式。坚持富国和强军常态化建设必须处

理好两个问题:第一是国民经济动员能力的保存与维持,第二是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成本控制。国民经济动员常态化的主要标志包括:动员机构活动经常化;动员基础平台稳态化;动员机制运作效率化;信息系统实用化。

关于军民融合理论发展问题。朱庆林教授认为,军民融合研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从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看,人们研究军民融合问题的角度不完全相同。一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来研究,二是作为发展战略来研究,三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来研究,四是作为政策理论来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看有以下特点:一是政策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多。尤其是围绕一个部门、区域、一个系统、组织、一项工作、活动等研究军民融合问题,对象比较具体,措施操作性比较强。二是各种研究思路交叉现象比较突出。往往把思想研究、学术理论研究和政策理论研究、战略研究混淆在一起,缺乏研究规范。三是学术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少。学术理论研究难度比较大,一方面需要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另一方面要建立规范的研究范式。这是军民融合研究逐步深入的必然过程,也是推动研究深入发展的最佳切入点。

朱庆林教授认为,构建军民融合基础理论体系任务比较艰巨。理论体系的形成应符合以下要求:必须是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概念、命题体系,有明确的逻辑起点和规范的逻辑主线;必须是理论思维的结晶,即对我国军民融合实践的理论抽象和概括;必须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当前,研究的着重点主要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军民融合思想研究;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军民融合运作率理论研究;中外军民融

合比较研究等。

在谈到国防经济学科发展时,朱庆林教授说,国防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加强军民融合应用研究应该成为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军民融合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研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军民融合发展研究;军民融合重大项目研究;军民融合机制和体制研究;军民融合发展统计与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等。

▼ 链接

【人物简介】朱庆林,江苏淮安市人,1948年7月生,1969年入伍,历任战士、文书、排长、指导员。1978年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83年到军事经济学院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开始研究国防经济。在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先后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技术三级教授,大校军衔,国防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3年退休。先后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专家,国家《国民经济动员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军队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通信评议专家,总后勤部军事后勤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科技咨询、人才评审委员会专家,军事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多种安全威胁下国民经济》(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国国民经济应变量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经济动员准备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战时经济概论》(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

构建实体经济服务的安全高效金融体系

当从金融弱国转向金融强国时,特别是当我国的金融改革不仅仅是现有体系的完善,还将涉及重构金融要素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体系演进和转型,将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已不能简单借鉴国际经验了,而是需要立足于我国的传统、现实环境和金融实践,直面现实中的混乱与困惑,既要克服从概念到概念,坚持问题导向,又要不为具体问题所束缚,需要“于无声处听惊雷”,突破观念约束,回归本源思考与探索。

■ 博安杰

虽然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来的,我们学习的也是西方的那套金融理论,但多方引进且相当程度都已“中国化”,使得我国的金融运行具有显著的

“中国特色”。近些年不仅海外学者,就连国内学者也不断担忧发生金融危机,但现实中却始终没有发生。可见对我国金融体系真实的运行逻辑、真正的风险点和有效的调控、监管框架尚未准确、清晰认识。

开放竞争和科技发展推动金融现实转型,我国的金融改革已从外在的“形”转向内在的“神”,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对未来5年的金融发展、监管和调控指明了方向,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部署,更顺利地推动金融改革以稳定发挥金融功能,除从现实运行中重新认识真实世界的金融体系这本“无字天书”,清晰定位财政、金融、监管、宏观调控和危机应对等不同职能外,还必须跳出所谓“国际趋势”,对其中蕴含的理念、功能、模式、改革路径等深层次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使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神韵,比如平衡微观主体的成长、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等。

我国微观主体普遍存在既希望政府放权

不干预,又希望政府信用支撑,尤其在困难和危机时期希望政府介入的矛盾心态,表现出“青春期”的躁动和非完全独立性。市场越是有活力,越有助于微观主体的成长,有助于市场的分层和融合,最终有利于金融安全,但同时也越容易产生混乱,给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带来挑战,短期内会引发金融的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内生信任的凝聚过程中,也将伴随着市场“中心化”的集中过程,引发“太大而不能倒”的隐患。金融体系的成长,如小孩的成长一般,需要管理和宏观调控理念的调适,特别对非系统性风险和反映经济周期的金融波动,需要有更大的容忍度。

市场的成长和转型,外来制度中国化和不同制度间的磨合,总会带来混乱和冲突。我国历史上和当前不缺乏悖论、乱象,如当前的空转、错配和短期化等。混乱和冲突是最好的老师,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秩序。也许正是在这种既矛盾又融合的对立统一中,才能动态完成市场的成长和转型。因此,如何合理回应市

场中的矛盾、混乱并自我成长,如何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同时将其引导到合意秩序框架内,需要宏观管理部门保持必要的谦卑和定力,抓住宏观层面真正在意的风险根源,利用现实有效的影响力(工具),进行管理和调控。金融体系“表外化”、“影子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是在当前激励约束机制下响应现实需求的反映,是经济体系“内生”的金融生态,但合理并不合意,需要在更宏观框架下实现良性循环。

我们似乎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分业与混业、产融结合模式已有战略上的选择,但现实中又广泛存在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甚至名股实债,维护金融体系的结果稳定等,间接融资似乎更符合文化传统和市场需要。我们仍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实际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存在复杂的股权、业务、资金等方面的融合,甚至产业和金融的多维度融合。

我国对未来的金融体系有渐趋清晰的愿

景,并看到了当前金融体系的不足和差距,但现实所谓的“问题”,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因和果是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需要从不同层次打破原有循环。因此,如何实现转变甚至转型却并不容易,在破和立之间,还需要从实践角度设计可行的改革路径和对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体系。既需要从“果”上要求,也需要在体制机制等“因”上转变,更需要各方主体包括政府在观念和认识上开放包容,自身转变带领社会改变。

总之,当从金融弱国转向金融强国时,特别是当我国的金融改革不仅仅是现有体系的完善,还将涉及重构金融要素和金融基础设施的体系演进和转型,将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已不能简单借鉴国际经验了,而是需要立足于我国的传统、现实环境和金融实践,直面现实中的混乱与困惑,既要克服从概念到概念,坚持问题导向,又要不为具体问题所束缚,需要“于无声处听惊雷”,突破观念约束,回归本源思考与探索。

中国经济是不是老二 重点要看人均指标



■ 徐诺金

第一,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强大到老二的位置。我们很多经济学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的经济什么时候超过美国,都在反复地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去列举中国有多少指标世界第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个总量已经足够大,已经大得快要超过美国了,发展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特朗普对中兴集团制裁,这才知道我们总量大的背后我们的经济还很脆弱。当特朗普摆出一幅架式要跟我们斗到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实力还没有达到跟美国拳击的阶段。

这提醒我们什么?就是我们作为学者,一定要看到我们总量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人均GDP,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我们跟美国,跟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这提醒,我们的经济学家还要研究怎么样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还要研究如何继续和做大蛋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特朗普提醒我们中国跟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还要加大做大做强总量,更重要的是要更加重视追求人均GDP,要追求人均国民收入,如何快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第二,特朗普给我们提醒的。在特朗普把美国的制造业作为他执政的一个重大的战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中国的制造业不像我们很多学者所说的产能已经足够大足够强了,我们不需要再发展制造业了。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科技力量这么强大的国家都把它作

为总统竞选和总统上台之后的执政战略,那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对我们中国的现阶段来说,制造业重不重要呢?特朗普上台之前,我们的主流理论都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足够大了,都主张把投资引向海外,引向第三产业,甚至有些主张发展金融。所以,我觉得这是特朗普给我们提醒的第二个方面。

特朗普给我们提醒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税费和营商环境改革的重要性。特朗普大幅度减税,把一大堆影响投资的政府法规都减掉了,这也是他在推行简政放权,改善美国的营商环境。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吸引外资,鼓励资本回流美国。那么发达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吸引外资?这么发达的国家为什么还要鼓励资本回流?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的政策主张呢?我们主张引导一些企业走向东南亚,引导一些企业远离中国。

第三,中美贸易战再次提醒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经济主体,你的发动机应该放在哪里,是放在别的地方,放在美国?整个中国的生产能力都为美国生产,还是应该给我们国民生产。世界危机提醒我们要转向内需,2008年以来我们转得成功吗?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因为我们内需里我们在控制投资,我们在所谓的刺激消费,经济学基本原理已经被主流经济学颠倒了。所以,搞了十几年,你根本就找不到真正的动力在哪里,真正的内需在哪里?我们还在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没有就业,没有收入的增长哪来消费?没有投资哪来的就业?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所以,这次特朗普又再次提醒我们,中国发展的动力不能放在别的地方,因为你是个大国,它不像新加坡那些东南亚小国。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执政之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敲醒了我们的国人,敲醒了在座的经济学家应该反思我们自己在过去十多年里,或者过去我们理论主张

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在美国实施的一些政策,他在国际上跟中国所展开的一些博弈,实际上应该给我们在座的理论工作者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前我们想一想中国的主流经济学都在谈论一些问题呢?大家是怎么看待和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主张,我们现在来看是不是存在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呢?

里我们的理论主张是什么,你真正的经济学问题搞清楚没有,你的政策主张不符合实际。如果我们从这四个方面中反思一下我们的理论问题,那我们就关注认识到,首先对中国来说,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进入了高质量阶段,重视质量是对的,但是高质量阶段一定是建立在数量增量的基础上的,没有数量的增加,这个高质量就是很难保障的,很难保障这么大的国民需求,很难保障人均GDP的快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提高。所以,我说经济增长做大总量还是高质量阶段应有之义。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发展的重要性,还是要把发展当作要务,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所有的改革如果是离开了最终的目的,没有真正提高人均GDP,提高人均国民收入,这些改革的主义都值得怀疑。如果改来改去改的增长速度越来越低,得到的

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多少提高GDP,那你这些改革有什么用?改了干什么?为什么要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使我们每个人都更富裕,这个改革才有意义。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学家还需要强调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重要性。要做好蛋糕,同时也要做大蛋糕,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理论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第二点,依靠什么来做大蛋糕,依靠谁来做大这个蛋糕?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们理论没说清楚的。所以,中国经济面临现在这些问题其实跟我们理论认识的偏差有关,在这种理论误区下有很多政策还不到位或者摇摆。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土地要素,还是技术创新,离开了真金白银的投资都是空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四大要素里所有的资本投入都围绕人力、土地、技术创新进行。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否定投资,不要把投资跟环境污染,跟能源消耗,跟产能过剩,跟重复建设连一起来。我们可以投人力资本,我们可以投资土地改良,我们可以投资技术创新,这都是投资。什么叫投资?就是增加明天的生产能力,提高明天的生产效能。投资里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这要避免,但也要靠投资去解决。设备的技术改造,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污染的排放水平也靠投资。所以,经济增长里的动力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不要把消费看成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四,靠谁来投资,这也是中国非常现实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讲要扩大民间投资,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没错,但是在市场悲观的条件下,在整个投资它的特点是一次性投入规模大,回收周期长,这个阶段的很多大型投资的时候,民间

力量不够,市场力量不愿意进入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在这里面的作用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千万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认识到在中国现阶段,在中国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投资里的重要性。如果这么一个逻辑成立,金融问题投资的来源怎么解决,金融的力量怎么发挥,地方融资平台怎么看,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没有这个认识,那我们就会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对地方政府的利用杠杆,对地方政府的其他一些投资行为存在不正确的认识,如果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会采取不正确的政策,这些不正确的政策就会导致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得不到肯定,正常的融资渠道得不到解决,那它只能走表外非正常的融资渠道。所以,最后“三去一降一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去产能带来钢铁、煤炭等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去库存带来房价倒挂,去供给带来整个银行贷款放不出去,地方政府使劲在清理债务。债券市场都在违约。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是特朗普给我们带来的吗?是现在的强监管给我们带来的吗?不是。实际上与我们对一些问题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有关,因为理论上认识不正确,政策没有连续性,没有长期性,就导致了政策的短期化,政策的碎片化。所以,最后导致了我们的预期效果没达到,最后杠杆供给力反升,成本越来越高,投资的收益率越来越低。所以,整个市场不良率在上升,整个经济金融的复杂局面更加复杂。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不是政策问题,而是理论问题。我们作为学者,作为一个论坛,作为这个论坛的一个成员,我们一定要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认识清楚才能出主意,否则我们出的主意会导致不理想的结果。这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给大家抛出的一些问题,供大家共同研究参考。